

## 专题

（上接9版）

归到词汇学。如此一来，词汇学下的定义就和裘先生的理解不一样，不过后来也没引起什么争议。至于更深层次的影响，这不是短期就能显现的。我不能做太多的评价，还是让学界自由评判吧。

语言学带了个头，其他社会科学也要做名词审定，就过来找我们取经。比如我们院的社会学所，他们难度就很大，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学偏向于自然科学，相对中性。哲学所的工作也不好做，国内外的术语体系不一样，同一个术语更容易会产生不同的理解。尽管如此，由于院里十分重视这项工作，所有的研究所都要开展，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工程。

在引入现代语言学以前，语言学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叫小学，分为文字、音韵和训诂，基本对应了文字、语音和语义。但是语法这一块就比较薄弱，没有词法、句法这样的西方概念。19世纪末，出了一本《马氏文通》，用了很多中国的文献材料，而语法照搬了西方。语法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大门类，研究的人多，各个门派都有。曾经我们把西方理论视为禁忌，现在则要提防另一种倾向，即用西方的研究结论来替代汉语中出现的实际情况。术语中国化，名词审定在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工作，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。比如字本位的语法，最早可以追溯到赵元任先生，他一辈子研究汉语语法，认为字很重要，说我们应该多考虑字的问题。后来北大的徐通锵先生提出字本位，华东师大的潘文国先生专门写了关于字本位语法的书，但目前还没有成为定论。字在语言学的哪个层次，这个界定很复杂。字兼不同的语言成分，它可能是语素，可能是词，有时一个字就是一句话。

包括语言学在内，社会科学领域的名词审定不至于有很强的约束力，换句话说，是有弹性的。如果也像国家标准、部门标准那般严格要求，就会陷于被动，也不客观，我们不会有这种期望。

“我的理解是，名词审定在辞典类型成果之上，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”

周荣耀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）：

我对名词审定的最初了

解，应该是自然科学。人文科学有它的特殊性，难以处理，在吸取了一些经验后才开始慢慢地起步。2008年，名词委希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可以陆续开展名词审定工作，但是学科太多，组织起来繁琐。他们就想到中国社科院，有了统一部署，推进起来就会容易不少。科研局找我们谈，说要做这个项目时，我们心里不是非常乐意。一方面是当时的认识不清楚，兴趣也不大，以为和编辞典差不多，而辞典作为科研成果在社科院很难排上号。现在都说创新，编辞典还能怎么创新？另一方面，涉及的人员比较多，一个人肯定没办法做。后来认真看了工作文件和审定要求，意识到这和想象中的编辞典有很大区别。我的理解是，审定工作的高度是在辞典类型的成果之上，看这些名词是否准确，是否具有科学性，相比辞书编纂，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考虑到这一点，想法就改变了。

听完汇报，大家都表示要把这项工作当成一个重要课题来做，名词委和院里商量后，制定了一整套的程序和要求。在和其他几个所一起开会时，我一下子感觉到，虽然大家都是人文社会科学，但比较而言，世界历史这个学科的名词最难处理。说得通俗一点，世界历史的界线没有“框死”，什么内容都能往里面装，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名词。大家去翻翻世界历史的教科书，哪个时代会忽略重要的科学技术进步。纵向看，从古至今，时间跨度相当长；横向看，不管哪个学科，只要是历史上被人们认可的，都能被收录。问题是，不同学科的名词重复了怎么办？别的学科还没做，我们先做了，他们怎么办？科研局和我们沟通时就说了，“周老师，首先考虑的是世界历史应该做哪些，您不要管别人，想太多了就会束缚手脚。”

根据工作要求，我们成立了名词审定的课题组和专家委员会，大家集思广益，一起讨论。哪些名词应该收，学科里的名词应该如何分类，并形成了明确的意见。当时有一个问题讨论了很久，人名和地名收不收？我的第一反应是没办法收，世界历史不是一个筐，假设最后出版5000个词，把重要的人名地名都装进去的话，可能会占掉一大半的篇幅。最后的结论是，纯粹的人名地名不要，因其不构成学术意义，也不在科学技术的范畴之内，但是涉及到人名地名的学术名词要收。举个例子，“斯大林格勒”是地名，我们不收，收的是“斯大林格勒战役”。当初设计结构时费了很多脑子，有些是全球性的

名词，有些是地区性、国别性，那么框架怎么处理？后来的想法是做综合，古代这部分集中起来，不考虑东南西北，后面再划分美洲、欧洲、拉丁美洲、亚洲、非洲。在翻译英文名词时，我们主要参考新华社出版的地名译名对照表，对于不常见的名词，有现成的译法就采用，没有的话就根据自己的感觉来翻译，力求通俗一点。

接手这份工作时，我有一些想法，比如参与课题组的人不能多，凡是参与者都要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，可以做事，年纪不要太大。我不是看不起老专家，而是指挥不了，名词审定的任务有时间要求，你让我成天盯着他们交稿，那真是要了我的命了。归结下来，我们需要能喊得动的人，一般是所里四五十岁的副研究员（为了保证质量和效率，在审定工作完成前，限制课题组的人员申请其他课题），而审定委员会必须由重量级的人员组成，基本上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世界史领域的专家。这样一来，运转比较顺畅，但也会碰到问题，这与社会科学的复杂性有关。选定一个名词后，往往会有多种解释，面对分歧，如何解决？审定一个名词，我们会把各种与之相关的论述拿出来比较，有明显差别的要单列，进行专门讨论。之所以要慎重，是因为名词审定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。

第一批名词出来后征求意见，对于“日本法西斯”这个词，一个在同龄人中比较拔尖的中年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。他说这是虚构的名词，我为此专门作了一番解释。“二战”又被称为“反法西斯战争”，从逻辑上讲，中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战胜国；“法西斯”这个词发展到今天，要有历史的观念，现在“日本法西斯”的提法比较少见，但翻翻过去的文献就有，一些老区的山墙上还留着“打倒

日本法西斯”的标语。时至今日，“日本法西斯”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。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也有区别，在我看来，种族优越感、到处抢占生存空间，这些特点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坚持要留下这个名词。当然，对于同行们的不同意见，既要谨慎判断、仔细推敲，也要积极学习、善于吸收。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时间和地点，再加上历史观的差别，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
人文科学反映的是认知问题，肯定会有不用看法。面对存有较大争议的名词，我们一般是回避的，尽量不收，否则只能把各种看法都罗列在一起，这样才显得公允。当然，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可供参考、比较的数据就越，因此更容易形成一种共识。

做完了世界历史的名词审定，我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性有了更清晰的思想认识。在大的历史学的范畴下，世界历史算是比较年轻的学科，与考古、中国史都不能比。依据原先的学科划分，世界历史是历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，现在升级为一级学科，这说明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看法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。

### “名词审定关乎科学研究与日常生活，让国家的政策制定有了更多依据”

陈杰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）：

在自然科学领域，医学是一个比较大的门类。过去学医时讲“三理一剖”，即生理学、病理学、药理学与解剖学，我从事的是病理诊断，迄今有40年了。病理学是干什么的？很多人一开始可能不清楚，现在慢慢有了认识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每周一次MDT，即多学科综合治疗



从事病理学名词审定时的部分参考资料

(multi-disciplinary team)。面对一个病人，十几个科室在一起讨论，临床表现很像某种疾病，但仅仅靠影像学来判断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有病理的证据，确诊以后才能制定治疗方案，所以有人说我们是“大夫的大夫”。

记得是在上世纪80年代，我买过一本医学百科的书，里面都是基础的医学名词，收录的病理名词很少。前些年，启动了病理学名词审定工作，光是确定范围就花了很多时间，走了很多弯路，因为和病理沾边的名词太多了。大家的看法是，范围不能过宽，也不能过窄。过宽就把跟医学有关的词都收了进来，显然不合理，过窄则把属于自己的名词拱手让给别人。经过取舍，病理的基本名词是两三千，将来修订时还会继续增补。审定过程中，我们会参考世界上公认的医学专著，像美国的外科病理学、世界卫生组织的肿瘤分类，以及其他一些经典的教科书。

我们邀请了一大批全国有名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，有北京的（协和、北医、301医院），上海的（复旦）、浙江的（浙大）、四川的（华西），等等。按照我们的设想，审定病理学名词是为了规范学科术语，避免出现名称翻译和使用的混乱。临床的病名与组织胚胎的概念不太一样，后者喜欢用“成某某细胞”。“纤维母细胞”（fibroblast）长瘤，我们说是“纤维母细胞瘤”，组培那边把fibroblast翻译为“成纤维细胞”，如果对应起来叫“成纤维细胞瘤”就很别扭。再比如“神经母细胞瘤”的说法用了几个世纪，现在改为“成神经细胞瘤”。病理学对临床的影响比较大，不像解剖或组培的名词是规定好的，病理确定了是什么疾病，临床就跟着采用一样的名词。

根据中华医学学会的安排，每个学科各自编一本名词，这样做就会出现很多重复。我们在开会时就提了意见，但在目前的情况下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重复的名词在不同学科下面，表述会不一样，比如“肿瘤”，病理和外科关注的侧重点不同，解释也就有了区别。

谈及医学名词审定工作的重要性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关乎国计民生。拿医保报销来说，如果病名不一样，肯定会到处碰壁。现在要做医疗大数据，没有规范化的名词，那么未来产生的数据都不可能形成真正有用的大数据。但是反过来，在完成了名词审定后，无论科学研究、日常生活还是国家政策制定，就有了更多依据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统一的名词，这是基础性工作。